

福祉视角下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分析*

□ 白 描

内容提要: 社会关系是构成福祉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实地调查资料,从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两个角度分别选取相关指标对农民社会关系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客观福祉层面,受访农民对正式的社会组织的认知和参与程度普遍较低,他们的社会关系仍以非正式联结的形式为主。总体而言,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依靠最多的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其次才是亲缘关系,而业缘关系在农民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中所占地位有限。在主观福祉层面,受访农民对其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并且该指标在个体之间差异不大。为了提高农民的福祉水平,在制定相关福祉政策时应瞄准农民家庭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改善情况。

关键词: 社会关系; 农民; 正式的社会关系; 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DOI:10.13246/j.cnki.iae.2016.12.006

一、引言

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在物质与精神活动中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产生一定的关系并且相互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关系”。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多重角色,例如,他既是 A 的同事,又是 B 的朋友,同时还是 C 的儿子和 D 的父亲……这些关系连结成社会关系网,不仅使个体在社会平面中得以定位,而且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影响。我们通常所说的人际关系属于一种社会关系,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关系。从概念上讲,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往往依据不同标准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多个类别。例如,按照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不同,将其分为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四类。依据规范程度的不同,社会关系被分为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两类。前者指受一定程序与

则制约并已形成制度的那部分社会关系,如各种娱乐团体、公益组织等;后者涵盖了所有无固定模式又未形成制度的社会关系,如亲戚关系、夫妻关系等。

现有关于社会关系的研究多为社会学范畴内的探讨(Francesco, 2009),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含义与测量(施建锋等, 2003)、变迁趋势(王晓毅, 1990; 熊跃根, 2005; 许平, 2007)以及影响因素(唐有财等, 2008; 祝平燕, 2010; 熊跃根, 2005)。相比之下,基于福祉视角对社会关系相关问题的探讨则较少(苑鹏等, 2013)。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像收入、消费等可以直接被量化和比较。旧福利经济学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对推进社会关系的研究作用有限。以帕累托、勒纳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运用序数效用理论展开研究,使得像社会

* 项目来源: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国农民福祉研究”项目的阶段成果。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苑鹏研究员对本文分析指标选取提供的宝贵思路。当然,文责自负

关系这一类指标被量化成为可能。其后伴随阿马蒂亚·森等对福利研究的拓展,满足感在个体之间的比较变成了可能。近年来,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沈洁,1996;周凤华,2010;王春光,2011;芮洋等,2011;乜琪,2012),福祉逐渐被拓展到了收入、教育、健康以及政治等多个维度。事实上,社会关系也是构成福祉的一个重要维度。一方面直接对个体福祉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影响收入、就业等其它福祉维度而间接影响个体福祉。社会福祉是

个体福祉的加总(庇古,1920),从该意义上而言,社会关系的问题实则关乎福祉民生。2014年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约为45.2%^{*}。而现有研究对该重要人口构成群体社会福祉的关注并不多。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将研究主体定为农民,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以期在把握农民社会关系规律性特征的基础上,为探讨如何改善农民社会维度的福祉提供实证参考。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农民福祉研究”2012年和2013年的农户调查。这两次调查均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生活状况等主要福祉维度,在有关社会关系的问卷设置方面采取了相同的思路,即分别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选取指标考察农民社会福祉状况,只是因为调查重点不同,2013年的问卷中对家庭关系的问题有所减少。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社会关系状况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其规律性特征并未在年际间出现剧烈变化。为了最大限度利用样本数据,下文对这两年的调查资料做统一分析。

样本选择方法具体如下:2012年的调查,首先将全国所有县(或县级市,下同)按人均纯收入由低到高进行排序,然后依据尽量在同一个省的原则,分别从高、中、低三档县中各随机抽取两个县作为样本县(分别是山东的邹平和胶州、陕西的蒲城县和绥德县、河南的西平和伊川),然后在每个县随机抽取6~10个村进行农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487份。2013年的调查,首先将各省(或自治区,下同)按照人均纯收入由低到高进行排序,依据随机抽样原则选定江苏、宁夏、贵州、江西和辽宁五个省,然后在每个省随机抽取两个县作为样本县(分

别是辽宁的兴城和凤城、宁夏的盐池和彭阳、江苏的洪泽和启东、江西的星子和安义、贵州的晴隆和纳雍),并在每个县随机抽取2~5个村进行问卷调查,最后获得有效问卷1000份。

在问题设置方面,两年的调查都从正式的社会关系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两个角度出发选择客观指标。正式的社会关系主要涵盖农民合作组织、老人协会、文艺队、各类兴趣组织、宗教组织、红白理事会以及其它组织等(2013年的调查对部分相近的组织进行了合并)。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主要考察了农民家庭内部的关系(包括与另一半、父母以及子女之间的关系)和遇到一些情境(例如家里有急事、需要借钱、托人找工作、办红白事或有家庭纠纷)时,农民想到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包括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的广度。在主观福祉层面,主要采用主观满意度指标来评估农民社会福祉的现状。

在这两年的调查中,有效样本的平均年龄均为50岁左右,年龄范围基本相同(分别是17~83岁和19~84岁);90%以上的受访农民都已结婚;男性所占比例虽然都略高于女性,但性别比例基本比较平衡。

三、社会关系与福祉之间的联系

社会关系是构成福祉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对福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关系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数据计算所得

** 福祉分为客观福祉与主观福祉两类。前者指个体实际的生活水平;后者指个体对生活的主观满意程度

*** 血缘关系指狭义的血缘关系,包括与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儿女等直系血亲之间的关系;亲缘关系是指与除血缘关系之外的家族其他亲戚之间的关系;地缘关系是指与邻居、同学、朋友、村里的能人大户、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业缘关系是指与同事、工友之间的关系

本身作为福祉的一个要素,直接对福祉产生影响;二是社会关系通过影响其它福祉维度,间接对总福祉产生影响。

(一) 社会关系与总福祉

所谓福祉,从个体角度来看,是指其实际的生活水平及其对生活的主观感受;从国家角度来看,就是国计民生。不可否认,福祉是一个复杂的范畴。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研究的不断深入,福祉逐渐被扩展到收入、教育、健康、政治参与、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多个维度,当然也包括社会关系这个维度。如果将福祉看成是由众多小积木堆积而成的大模型,那么社会关系就是其中的一块小积木,这块积木是方是圆、是大是小、呈现什么颜色,都会对福祉模型的最终效果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民。按照上述逻辑,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如何,一定会对其个体福祉产生直接影响;而考虑到社会福祉是个体福祉的加总(庇古,1920),那么农民社会关系状况对社会福祉也将产生影响。

(二) 社会关系与其它福祉维度

由于构成福祉的维度比较多,并且各个维度之间普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对其它福祉维度的影响客观上比较复杂,因此,本文不能对社会关系与所有福祉维度的关系进行全面剖析,仅就它与几个主要福祉维度之间的关系作简要阐述。需要说明的是,分析社会关系与其它福祉维度的关系目的仍在于更全面地把握社会关系对总福祉的影响。

首先,社会关系与主观福祉之间的关系:既然社会关系是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联系,是构成个体生活的重要层面,那么,它一定会对每个人的生活状况进而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一方面,良好的社会关系是对个体交际能力的肯定,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社会认同感,进而改善个体的主观福祉。另一方面,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助于优化个体的生活处境,毕竟置身于一个比较融洽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在日常行为处事和交往时遇到阻碍的机率和社会关系较差的情况相比要低,而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帮助与支持的概率则会增加,从而有利于改善生活状况,提升主观福祉水平。

其次,社会关系与就业、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收入、就业和消费是构成个体客观福祉的重要层面。良好的社会关系意味着拥有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个体无论在找工作时还是在工作过程中都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帮助,即社会关系的状况对就业有正向影响。考虑到就业与收入、消费息息相关,那么社会关系亦间接地影响着个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此外,如前文所述,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利于提升主观福祉,主观福祉改善了,对个体的就业进而对收入和消费都有积极的影响。

再次,社会关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首先,健康并不仅指身体状况,还包括心理层面。一般而言,个体从良好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心理满足感越多,越有利于其心理健康,进而对其身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其次,拥有稳定的收入和一定水平的消费是对个体健康的重要保障^{*}。既然社会关系对收入和消费均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那么其对个体健康亦存在正向作用。最后,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强,个体在生病时得到照顾或者在求医问药时获得帮助的机率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关系对健康亦有积极作用。

然后,社会关系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的质量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认同感。从逻辑上讲,一个人获得的社会认同感越多,越关心社会,从而参与政治活动以改善身处环境的意愿越强烈,可能性越高。另外,社会关系网络越强,个体获得信息的渠道越广泛,越有利于提高其对政治参与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率。

最后,社会关系与时间利用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耗用一定时间发展和维护的。从这点而言,社会关系状况对个体时间利用是有影响的,毕竟时间利用是个体对时间主观分配的结果。另外,通常人们在某件事情上获得的满足感(即主观福祉)越多,即主观福祉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分配更多的时间在这类事情上。考虑到社会关系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其对个体的时间利用也将产生间接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社会关系不仅是构成福祉的一个重要维度,其对福祉的其它维度亦存在

* 当然,此处的意思并不是生活越奢华,质量越高,而是指日常的吃穿用度对个体身体情况有直接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因此,本文对农民社会关系状况的分析亦是对农民福祉状况的探讨。

四、客观福祉视角下农民社会关系的状况

因为社会关系本身就是构成福祉的一个维度,所以通过选择客观指标来衡量农民社会关系现状的过程亦即对农民客观社会福祉的评估。本文参照前文所述社会关系依据规范程度的分类方式,从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社会关系的主体是人。对中国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家庭是其日常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因此本文以家庭成员(包括夫妻、父母以及子女)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农民非正式社会关系的起点*。

(一) 农民夫妻关系普遍比较密切,分开时联系频繁

在调查中,衡量受访农民夫妻关系的指标包括“你们夫妻之间信任程度如何?***”、“遇到事情时夫妻之间是否商量?”、“过去一年你们夫妻分开的时间有多长?”、“分开时多久联系一次?”、“夫妻

之间是否吵架?”、“吵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最不满意对方的地方有哪些?”。其中,后三项在2013年的调查中并未涉及。

这两次调查,90%以上的农民已婚。在这些农民中,67%的农民夫妻在过去一年中从未分开。将一年中所有分别时间加总后以分开一个月内者居多,其次是分开半年以上者,二者占已婚农民的比重分别为14%和10%。单独从每次分开的时间长短来看,夫妻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多为一个月,其次是一个月以上且三个月以内,二者合计占比75%。在过去一年中,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达半年以上者以及分开时间加总后达半年以上者所占比重都在10%左右。由此可见,受访农民夫妻大部分常年生活在一起,即使分开,亦是短期分别。被调查的农民中,仅73%在外地就业,多数受访农民就在本乡镇内就业,从而就业不是导致受访农民夫妻分开的主要原因。

表1 农民夫妻分开的情况

	分类	样本	比重(%)
过去一年夫妻不在一起的天数加总	0	947	67
	(0~30]	191	14
	(30~90]	76	5
	(90~180]	63	4
	(180~365]	136	10
过去一年夫妻分开最长一次的天数	(0~30]	152	44
	(30~90]	106	31
	(90~180]	47	14
	(180~365]	37	11

注:(1)比重指占有效样本的比重,下同;(2)小括号表示不包括边界值,中括号表示包括边界值,下同

为了进一步考察受访农民夫妻关系的亲疏程度,在2012年的调查中设置了夫妻分开时联系频率的选择问题。43%的农民夫妻在分开时每天都联系,约31%的农民每周至少与不在一起的丈夫

(或妻子)联系一次,8%的受访农民夫妻分开时每月至少与对方联系一次,而没事不联系者所占比重仅为17%。可见,虽然联系的方式不尽相同,受访农民夫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比较密切。

* 本文并未对所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逐一进行分析,仅结合调查结果对有代表性的一些社会关系进行剖析

** 该指标在2012年被设计为对不同程度选项的选择,2013年则采取打分制

(二) 农民夫妻之间信任程度很高,遇事总会商量

联系频率这一指标只在特定情境下(即夫妻分开时)才能起到衡量农民夫妻关系的作用,在调查中,笔者还设计了另外一些指标用以评估农民的夫妻关系。根据2012年的调查,几乎所有受访农民都很信任自己的另一半(占有效样本的96%),约3%的农民表示信任与否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夫妻之间完全不信任或表示不知道的农民仅占1%。在2013年的调查中,约95%的受访农民认为夫妻之间的信任程度达到了6分以上。其中,65%的农民表示完全信任彼此,分别有11%和13%的受访农民认为信任程度达到了9分和8分。而信任度为0的样本农民仅占有效样本的1%;受访农民中并没有选择信任程度在1分至4分档的样本。据此可以看出,受访农民夫妻之间的信任程度普遍较高。

当遇到事情时,89%的受访农民会与丈夫(或

妻子)商量,而很少商量与根本不商量者所占比重分别为2%和3%;此外,还有6%的农民表示商量与否得看是什么事情。从遇到事情时的处理方式来看,受访农民普遍比较尊重自己的另一半。

(三) 农民夫妻很少吵架,脾气、生活习惯和收入是导致彼此不满意的主要因素

2012年的调查对农民的家庭关系关注比较多,所以多设计了三项指标,即夫妻之间吵架频率、吵架原因以及最不满意另一半的原因。31.3%的受访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从不与另一半吵架;62%的农民表示他们夫妻虽然吵架,但次数很少;经常吵架的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约为7%;而天天吵架者所占比重不到1%。

导致受访农民夫妻吵架最主要的原因是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其次是经济收入不理想和子女教育问题。而相比之下,在赡养老人、脾气性格、处理与对方家人的关系以及日常消费分配等方面,农民夫妻之间意见相对一致,很少为此吵架。

表2 农民夫妻吵架的原因

	样本	比重(%)
经济收入低	30	10
子女教育	32	11
赡养老人	4	1
处理与对方家人的关系	5	2
对方的不良习惯	24	8
鸡毛蒜皮的小事	191	64
消费支出	3	1
性格不和或脾气不好	5	2
其他	6	2

根据表3,约45%的受访农民对自己的另一半并无不满;而引起丈夫(或妻子)不满的原因按照占有效样本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是:脾气急、生活习惯不好、其他以及收入低。从分性别的情况来看,因另一半身体不好、收入低以及生活习惯不好而不满的男性受访者均达到了80%以上;相比之下,女性因不会过日子、对自己家人不好、脾气急、性格太软弱以及其它原因而对另一半不满者居多。可见,男女受访者对另一半不满的原因存在较大的差异。

(四) 农民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普遍比较密切
在两次调查中,均设置了如下两个问题“与

未住在一起的父母之间的联系频率”和“与未住在一起的子女之间的联系频率”,目的在于考察农民与除另一半以外的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由图1可知,56%的受访农民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双亲已然去逝);其中,每天都与父母联系者占20%(绝大多数因住在一个村里而采取的是直接见面的方式);每周和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者分别占19%和13%;此外,没事不联系的农民所占比重最低(约4%)。与未住在一起的子女之间的联系频率,按照对应样本占有效样本的比重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每周至少一次(39%)、每月至少一次

(19%)、每天联系(16%)以及没事不联系(8%)。此外,还有18%的受访农民不适用该项指标(例如没有子女)。总体而言,农民与未住在一起的父母或子女之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表3 农民对另一半不满意的原因

	挣钱少	不会做家务	脾气急躁	对受访者的家人不好	不会过日子	性格太软弱	身体不好	生活习惯不好	没有	不知道
样本	27	16	81	3	4	7	3	65	203	5
比重(%)	6	4	18	1	1	2	1	15	45	1
其中:男性	25	8	34	1	1	3	3	54	100	0
比重(%)	93	50	42	33	25	43	100	83	49	0

注:此问题设计为可多选;最后一行的比重为男性样本占对应第一行所示样本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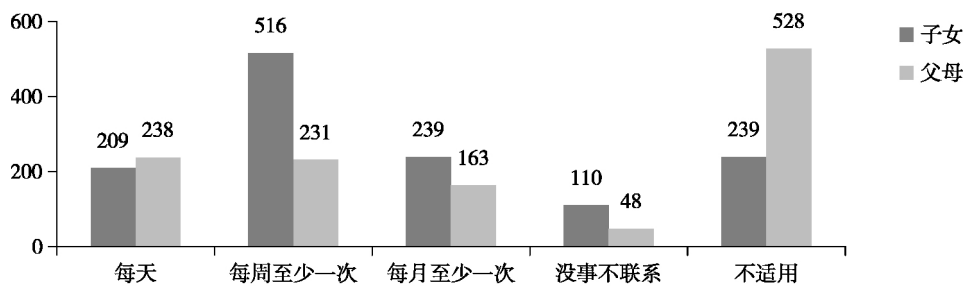


图1 与未住在一起的父母或子女之间的联系频率

(五)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构成农民非正式社会联系的主要层面

进一步,为了更全面考察农民社会关系的客观状况,在2012年的调查中设置了以下五种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情境:家里临时有事、急需借钱、托人找工作、办红(或白)事以及产生家庭纠纷。而基于这些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都属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表4列出了面对上述情境时农民首先想到的社会关系的分布情况(2012年)。当家里临时有事或需要借钱时,64%的受访农民首先想到找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帮忙,约24%左右和12%的农民

分别首先想到了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在遇到家庭纠纷时,约50%的农民首先想到找与自己有地缘关系的人帮忙,首先想到利用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分别为32%和22%;当托人找工作时,受访农民首先想到的社会关系的分布规律与遇到家庭纠纷时相同。此外,当家里有红(或白)事时,1/2的农民首先想到了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首先想到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农民所占比重比较接近(约20%左右)。表4充分说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构成受访农民社会关系的两个主要层面。

表4 五类情境下农民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分布情况

	亲缘	血缘	地缘	业缘
当家里临时有急事时	57	292	111	0
当急需借钱时	52	274	96	3
当需要托人找工作时	20	42	88	14
当产生家庭纠纷时	35	50	72	0
当家中有红(或白)事时	114	192	81	0

2013年的调查保留了托人找工作和急需借钱

两个情境,增设了以下四个问题“有心事时向谁

诉说”、“最信任的人有哪些?”、“临时有事求助的人有几个?”以及“你平日经常聊天或串门的人有几个?”;而在选项方面,除四类社会关系外,还增加了“靠自己或只相信自己”以及“不适用”这两项。根据表5,在托人找工作时,44%的受访农民选择靠自己,选择利用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者所占比重较为接近,分别为38%和33%,选择利用血缘关系的农民占19%。急需借钱时,选择四类社会关系的农民所占比重由高到低排序后居前三位的是:亲缘关系(66%)、地缘关系(47%)以及血缘关

系(32%)。66%的受访农民有心事时会向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倾诉;倾诉对象为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者所占比重分别为23%和25%。88%的受访农民最信任的是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75.9%的农民在该问题上选择了地缘关系;相比之下,选择亲缘关系的农民所占比重略低一些(约为56.3%)。在后三种情境下,选择“靠自己或只信任自己”以及“不适用”的农民占有有效样本的比重都较低。此外,与2012年的调查结果相同,在所有情境下,选择业缘关系的受访农民很少。

表5 四类情境下农民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分布情况

	血缘	亲缘	地缘	业缘	靠自己/只信自己*	不适用
当需要托人找工作时	198	331	383	5	443	68
当急需借钱时	324	655	472	2	85	58
当有心事想诉说时	656	234	251	1	46	92
最信任的人有谁	883	563	759	2	55	17

注:这四类问题设定为可多选,故有效样本总量大于1000,对应样本占有有效样本的比重之和亦不等于100%

在2013年的调查中,所有受访农民遇到急事时都至少可以找到1个或以上的人来帮忙。其中,表示可以找到6个或以上的人来帮助自己的农民占比最高,约为78.7%。约97%的受访农民经常串门或聊天的人有1个或以上;67.1%的农民经常串门或聊天的人达到了6个或以上;表示自己经常串门聊天的人数在3~5个人之间的受访农民占有有效样本的比重均在6%左右。由此可见,农民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普遍较为密切。

(六) 农民对正式的社会组织的认知和参与程度普遍不高

2012年和2013年的调查所涵盖的正式的社会组织的类型略有差异,为最大限度利用样本数据,本文按照2013年的分类标准对2012年的数据

进行了合并^{**}。从调查结果来看,14%的受访农民表示本村有农民合作组织;在他们中,仅25%的农民实际参加了该组织;约有10%的农民并不清楚村里是否有这类组织。村里建有正式的各类兴趣组织的农民所占比重约为32%;其中,有31%的农民实际参加了该组织;此外,4%的农民对村里有无兴趣组织很含糊。77%的受访农民表示他们村并没有建立正式的老人协会或红白理事会;6%的农民并不清楚村里有无老人协会和红白理事会;而有该类组织的农民中实际参加者不足1/3。由此可见,农村建立起的正式的社会组织比较少,并且在有这些组织的村里,农民实际的参与程度普遍偏低,还有一部分受访农民甚至说不清楚自己生活的村里到底有没有建立这些组织。

表6 农民参与正式社会组织的情况

	农民合作组织	老人协会/红白理事会	各类文艺兴趣组织	其他
本村有	201	255	465	29
其中:本人参加	51	60	143	3
本村没有	1119	1137	948	1090
不清楚	157	85	61	58

注:本题被设定为可多选,故有效样本总量大于1487

* “靠自己”针对前三个问题,“只相信自己”针对“最信任的人有哪些?”

** 具体处理方法是:保留农民合作组织,将老人协会与红白理事会合并,将兴趣组织与文艺队合并,剩下的各类组织统一归为其它组织

五、主观福祉视角下农民社会关系的状况

客观指标诠释了农民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与此不同,主观福祉视角下的各项指标衡量的是农民对其社会关系的主观感受。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性格、生活状况以及心理不同,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亦千差万别。举一个例子,假设A和B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客观条件完全相同,并且A性格很乐观,易满足,相比之下,B性格比较悲观,那么A从相同社会关系中感受到的幸福可能比B多。为了全面把握农民社会福祉的现状,本文下面对社会福祉的主观层面进行分析。

主观福祉是一种感受,它不能被直接测量和比较。常用作法是以满意度指标作为衡量主观福祉的工具指标。在调查中,我们让受访农民按照满意度越高、分值越高的原则,在1~10分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人际关系进行打分。

从调查结果来看,受访农民对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普遍比较高,平均值分别达到了85分和88分。除此之外,对这两项关系的满意度达到满分的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分别为44.7%和48.1%;而对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给出最低分的农民所占比重则仅有1%左右。可见,受访农民对社会关系的主观评价相对一致,该指标在个体之间的差异不明显。同样,农民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为最低分者亦仅占有效样本的0.3%;但与上述两项社会关系相比,受访农民对其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达到10分者所占的比重偏低,约为29%。虽然如此,农民对其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平均值亦达到了82分。由此可见,农民从社会关系中感受到的主观福祉水平比较高。

表7 农民社会关系满意度的情况

	家庭关系	婚姻关系	人际关系*
最大值	10 (658)	10 (705)	10 (289)
最小值	1 (15)	1 (7)	1 (3)
平均值	85	88	82

注:括号中的数值表示给出对应分值的样本量

六、结论

本文基于福祉视角,利用农户调查资料,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选取指标对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情况均表明受访农民社会维度的福祉水平普遍比较高。而具体结论包括:

首先,受访农民拥有的正式的社会关系有限,正规性的社会组织在农村发展情况并不理想,表现为:(1)在所调查各村中,已建立起正式社会组织的村并不多;(2)在认知方面,两年的调查中都有一部分农民根本说不清楚在自己生活的村里是否有正式的社会组织;(3)即便在有正式性的社会组织存在的村里,受访农民实际参与这类组织的比

重亦普遍较低。

其次,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构成农民非正式社会关系的两个主要方面。从实地调查来看,大多数受访农民就在本乡镇内就业,即便是离开也主要受临时性因素的影响而以短期为主。因为长期居住在家里,所以有受访农民主要的社会交往发生在与家人及同村农民之间。此外,多种情况表明,业缘关系在农民非正式社会关系中所占地位有限,它并不是农民产生社会联结的重要渠道,因此对农民社会维度的客观福祉影响较小。

再次,农民夫妻之间关系普遍比较密切,体现在:彼此信任程度很高,分开时多数夫妻保持每天

* 该指标仅在2013年的调查中有所涉及

都联系,遇到事情时基本上都会相互商量,并且大部分受访农民除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外很少吵架。而受访农民与未住在一起的父母或子女之间联系亦比较频繁。

最后,从主观福祉角度来看,受访农民对自己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以及人际关系普遍满意度很高。事实上,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家庭关系和

婚姻关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其对收入、健康、教育、居住条件、社会安全等维度的满意程度。可见,虽然整体上受访农民相对收入偏低,但其主观福祉普遍较高,这其中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功不可没。由此,为了使农民的主观福祉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继续维护好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很有必要。

参 考 文 献

1. Putnam, R: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00
2. [英]庇古. 金镛译. 福利经济学. 华夏出版社, 2007(7)
3. 乜 琪. 从生存到权利——建国以来农民福利状态变迁. 农村经济, 2012(4): 3~7
4. 芮 洋, 姜世桥. 关于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思考——村治变迁背景下的农民福利问题研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 2011, 11(1): 1~7
5. 沈 洁. 社会福利问题与中国社会福利改革.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199(5): 31~37
6. 施建锋, 马剑虹. 社会支持研究有关问题探讨. 人类工效学, 2003, 9(1): 58~61
7. 唐有财, 符 平. 转型期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因素探讨. 浙江社会科学, 2008(11): 59~67
8. 王春光. 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福利问题研究.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1(8): 36~47
9. 王晓毅. 聚合、集合与整合——农民社会分析. 农村经济与社会, 1990(4): 12~22
10. 熊跃根. 论当代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资本建构与市民社会发展. 广东社会科学, 2005(5): 88~93
11. 许 平. 法国农村庇护性社会关系解体过程分析. 世界历史, 2007(5): 32~42
12. 苑 鹏, 白 描. 社会联系对农户生活幸福状况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六县 487 户农户问卷调查. 学习与实践, 2013(7): 86~96
13. 周凤华. 转型中国的福利意识形态转型. 北京论坛哈佛—燕京学社专场, 2012
14. 祝平燕. 社会关系网络与政治社会资本的获得——论妇女参政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 湖北社会科学, 2010(2): 27~30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责任编辑: 方 静

vision in th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ope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bers' heterogeneity.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serious heterogeneity between members i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operatives, ordinary members in the cooperatives choosing not to supervise the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s have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to make a lack of internal supervision i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operativ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combined with studying in the case of typic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operatives. This state is not conducive to realize the interests of ordinary member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untry's investment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In view of this phenomenon, 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at to weaken the proportion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of the core members and to narrow the resource endowme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re members and ordinary members to consider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aly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So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ell-being *BAI Miao*(39)

Social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well-bei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soci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angles of both objective well-be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ased on the rural household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rural residents' 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to the formal social organization is generally low and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 is still in the form of informal. In their daily life, rural residents rely on blood relationship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most, followed by the relative relationship, and the status of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rural residents' informal social relationship is low. The rural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family relationship, Marriage relationship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re generally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is smal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the related welfare policy should aim at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residents'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marriage relationship.

Village Response to Projects Entering the Village in Rural Governanc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Problems *LI Yaofeng*(48)

As the influence of project system on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grows, how projects entering the village can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become the key to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Existing researches emphasis on macro level and government viewpoint but ignore the response of village. Village response concludes three layers: recognition of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resources; evalu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demands and influence of other actors; way choice of intera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social action. Researches based on different projects find that the three layer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ith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The low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village response cause unexpected effects of projects entering the village, distant from the expected policy objectives. By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village response, the logic and problems of projects entering the village could be easier to explore. Only to optimize the village response capability could we fully 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agriculture supporting resources and take the leveraging effect of projects entering the village 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vitality.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Short-term Incentives and Long-term Cooper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on Game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DAI Weizhuo and WANG Dong*(55)

Informal Governance of Human Capital Failure: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Return on Human Capital *LI Baozhi LI Kai and MI Songhua*(62)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analytic framework about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return of human capital based on the social capital and labor market theory. QEM and ordered Logit approaches were used for the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w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capital of migrant worker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human capital return, through strengthening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easing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Moreov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rust and reciprocity are stronger than social network. The urban social capital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turn of human capital, which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The Impact of Foreign Anti-dumping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s *WANG Yinmei and REN Lijuan*(73)

At the background of development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deterioration of trade environment and aggrav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so on, China's agricultural trade is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its trade prospect is not optimistic. China's foreign anti-dumping not only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but also has an export effect on the related dome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reasoning can be